

如何更好的研究。如何傳播研究
的過程。

從「互動觀點」看生活世界：

社會建構主義與傳播研究

① 如何去拿過來呢？

黃鈴媚*

② 沒有自己的語言嗎？

就是被你拿過來，

《摘要》

而經過混同之後呢？

針對傳播學門主體性問題，本文主張，將人類生活世界視為一種互動產物之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是將傳播行為放在最主要地位的研究取徑，有助於建立傳播學門主體性以及提升學門的社會影響力。為了進一步了解社會建構主義對建立一個獨立的傳播學門之潛在貢獻，本文將從以下兩方面來闡明自社會建構主義衍生而來的「互動觀點」，可以如何提升傳播學門主體性以及其社會影響力：(1) 檢驗社會建構主義是否提供一個完整的「傳播解釋形式」？亦即對於人類生活世界是否提供適當的認知概念和有效的回應方式？(2) 假如社會建構主義提供一個完整的「傳播解釋形式」，傳播學者應該如何在研究實作層面進行「傳播解釋形式」之傳播研究？

關鍵詞：互動觀點、社會建構主義、傳播解釋形式、學門主體性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lmhuang@cc.shu.edu.tw

根據最近一篇關於傳播教育發展現況的研究（翁秀琪，2001），從1951年政治作戰學校新聞系成立以來，迄今國內已經有二十四校七十個傳播相關系所。整體而言，不僅數目可觀，系所名稱更是琳琅滿目，其中除了歷史比較悠久的新聞系、廣播電視系、大眾傳播系以及廣告系外，還設立印刷傳播所、口語傳播系、電訊傳播所、視覺傳達設計系所、資訊傳播系所、傳播管理系所、音像記錄所、資訊社會所、出版所、圖文傳播所、音像藝術管理所、音像動畫所、教育傳播與科技所、圖書資訊所、多媒體動畫藝術以及應用媒體藝術所；單就數量和系所多元性而言，說今日國內傳播學界中「眾聲喧嘩」，實不為過。

然而，在親眼見證台灣近十年來傳播系所快速成長的同時，我們也親身體驗傳播學門在國科會的學門分類中，先是很不容易地在1995年從社會學門獨立出來，而後卻在2000年再度被併入社會學門，理由是「傳播學界參與國科會提案的『能量不足』」（陳百齡，2001：44）。因此，在眾多傳播相關系所林立而塑造出來的「眾聲喧嘩」當中，我們似乎更應該靜下來思考一個根本的問題：傳播學如何成為一個獨立的學門（discipline）？本文延續前人對學門主體性的關懷（例如，翁秀琪，1997；須文蔚 & 陳世敏，1996；鄭瑞城，2000），提出回答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嘗試。

從社會連續的傳播學門的主體性

壹、解釋形式與學門主體性

問答：
 作為一個獨立的學門，需要具備若干條件，而當中最重要的是，必須提供一種思考、行動以及談論人類生活世界現況的獨特方式。*傳播學者* Deetz 稱其為解釋形式（modes of explanation）。Deetz 指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由許多不同的解釋形式所建構起來，這些解釋形式來自不同學門，也使用不同語彙；它們各自代表一種人類如何「關照生活世界的組織化方式」（a relatively organized way of attending to the world）（Deetz, 1994b: 567）。其次，每一種解釋形式對於人類生活世界（包括

社會的及物理的範疇)都必須能夠提供適當的認知概念和有效的回應方式，這個核心概念除了激發學門內部的想像力，也有助於聚焦相關研究，譬如，心理學門先後以「心靈」、「行為」、「認知」為研究焦點，以及「社會」概念之於社會學門，「文化」概念之於人類學門 (Powers, 1995)。然而，相對於這些明確的解釋形式，傳播學門內卻仍然欠缺一個類似的凝聚性概念 (Zarefsky, 1993；翁秀琪，1997；須文蔚 & 陳世敏，1996)，使得學門主體性經常成為一個被議論的焦點 (Wartella, 1994; Zarefsky, 1993)。

除了傳播學門主體性無法定位，Deetz (1994b) 也認為，相對於發展較為成熟的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等學門，傳播研究的社會影響力也顯得格外薄弱，而主要原因還是由於大部分傳播學者未致力於發展一個有別於其他人文社會學門的「傳播解釋形式」。為了扭轉傳播學門的劣勢，Deetz 建議傳播學者必須自我挑戰，不再從既有的心理學、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研究社會現象，而是「研究心理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現象如何在人類的溝通行為中成型」，亦即解釋目標、需要、動機、經濟階級以及社會結構等現象如何在人類互動中被製造與被複製 (Deetz, 1994b: 568, 577)；換言之，傳播學者必須不再將「傳播」視為一個「研究主題」(subject matter) 而是一個「觀點」(perspective)，也就是將人類的互動行為看成形塑生活世界的最主要力量。一旦傳播被視為一種觀點，區分「什麼是傳播」與「什麼不是傳播」不再有任何實質意義，能夠被區分地只是「傳播觀點」與「非傳播觀點」(Littlejohn, 1999:177)。

傳播觀點非僅是研究起

平心而論，Deetz 的建議並無太多新意，因為傳播學門內長久以來一直存在類似的聲音，相關論述被歸類在互動主義者取徑 (interactionist approaches) (Littlejohn, 1999) 或社會取徑 (social approaches) (Leeds-Hurwitz, 1995b, 1992a, 1992b) 的標籤下，而貫穿其中的理論主軸就是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onism) (Berger & Luckmann, 1966)。然而，儘管傳播界不乏自社會建構主義觀點撰述的教科書 (例

如，Deetz & Stevenson, 1986; Haslett, 1987; Leeds-Hurwitz, 1989; Pearce, 1994a; Pearce & Cronen, 1980; Powers, 1994; Sigman, 1987），學術性論述也未曾間斷（例如，Atkinson & Heritage, 1984; Deetz, 1994a; Leeds-Hurwitz, 1992a, 1992b, 1995b; Pearce, 1989; Shotter, 1990; Sigman, 1992b, 1995; Stewart, 1995, 1996），但它卻沒能成為領域內的主流團體，歐美傳播學者真正從社會建構主義觀點進行傳播研究者，仍舊屬於少數（Baxter, 1992; Deetz, 1994b）。然而，我們不能否認，視人類生活世界為一種互動過程之社會建構主義觀點，使得人類的傳播行為成為主要的社會動力，這種將傳播行為放在最主要地位的研究取徑相對於其它取徑，將更有助於建立傳播學門主體性以及提升學門的社會影響力。

因此，儘管社會建構主義觀點並非是一個新創的研究觀點，為了進一步了解社會建構主義對建立一個獨立的傳播學門之潛在貢獻，本文將從以下兩方面來闡明自社會建構主義衍生而來的「互動觀點」，可以如何提升傳播學門主體性以及其社會影響力：(1)檢驗社會建構主義是否提供一個完整的「傳播解釋形式」？亦即對於人類生活世界是否提供適當的認知概念和有效的回應方式？(2)假如社會建構主義提供一個完整的「傳播解釋形式」，傳播學者應該如何在研究實作層面落實「傳播解釋形式」之傳播研究？

貳、建構主義作為一個傳播解釋形式

儘管社會建構主義有其現代的內涵，但是它實際上卻是西方知識史中不斷重複出現的兩股對立聲音之延續：生活世界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真實（*reality*）或生活世界是一個主觀建構的真實？對於傳播學者而言，由此衍生而來的問題就是：傳播是用來正確地傳達外在世界的一種工具抑或外在世界是由傳播活動所決定？很明顯地，社會建構主義是屬於後者（Pearce, 1995）。假如要更往前推，上述爭論最早發生在 Plato 與 Gorgias 之間⁽¹⁾（Pearce, 1994b）；而對社會建構主義思維比較具體的影

從「互動觀點」看生活世界：社會建構主義與傳播研究 61

從「互動觀點」看生活世界 → 影向中
◎ 人類生活世界
◎ 傳播事件

響，除了來自二〇年代 Heidegger、Mead、Wittgenstein 以及 Dewey 等學者的思想，接著便是六〇年代的美國實用主義復興以及同時期的歐洲學者著作（包括 Bakhtin, Bourdieu, Derrida, Foucault, Habermas, Kristeva, Lumann, and Lyotard）(Deetz, 1994b)。因此，我們可以將社會建構主義的發展視為對科學的或實證的研究取徑之修正⁽²⁾；也因為如此，雖然我們很難對社會建構主義的定義提出單一的說法，但是並不難找出社會建構主義的明顯特質。

許多學者都曾歸納社會建構主義的主要特徵（例如, Cronen, 1995; Leeds-Hurwitz, 1992b, 1995a; Shotter & Gergen, 1994），我將他們的論點整理成兩大類，其中一類與研究實作較為相關，將在下一段落再作介紹；以下先介紹與本段主題（亦即對生活世界提供什麼認知概念和有效的回應方式）直接相關者。首先①人類生活世界（包括自我概念、情緒、角色、行動規則、關係、組織認同等）屬於一種社會真實，而社會真實不是先於人類活動存在的事實，因為人類透過符號（symbols）使用行為來創造生活世界。其次②，社會建構主義當中的「社會」二字有其特殊意義，它並非代表社會建構主義與社會學門有不可切割的關係，而是用來強調欲了解人類如何使用符號創造生活世界，必須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切入，而非選擇個人如何認知傳播事件的角度⁽³⁾。基於上述兩項特徵，也使得社會建構主義者以不同於其他學者的方式來界定傳播，譬如，傳播被視為一種「真實被產製、維持、修補以及轉化的符號化過程」（Carey, 1975: 17）或者是一種自我、他人以及世界被協力的（collaborative）、集體的（collective）建構之集體決策過程（Shotter, 1987）。

簡言之，人類經由互動（interaction）學習如何行為以及各類事物的意義，同時創造並維持組織、團體、家庭和體制等社會結構，因而互動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動力；亦即人類透過使用語言或其他符號系統的互動行為來創造生活世界，而語言或其他符號系統也在被使用的過程中被維持與改變。譬如，組織成員間各種故事的流傳（互動行為）以及

組織內部各種儀式的參與（互動行為）創造組織文化，因而不同的故事和儀式將形成不同的組織文化，也創造不同的組織（Pacanowsky & O'Donnell-Trujillo, 1982; Putnam & Pacanowsky, 1983; Smith & Eisenberg, 1987）；再者，「什麼是『家庭』？」並沒有固定的答案，因為「家庭」的實質內涵是透過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方式所共同建構；而子女對自己父母的看法也是一種建構的真實，其中包括多年來彼此間的互動、子女與他人針對自己的父母和什麼是「為人父母之道」的討論等互動行為之結果（Littlejohn, 1999: 14）。因此，Deetz (1994b: 572-573) 在比較資訊觀點 (information perspective) 與傳播觀點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的不同時指出，傳播觀點最主要的特徵在於同時強調訊息 (messages) 的建構特質 (constitutive processes) 以及集體行動的共決 (或協調) 特質 (codetermination and coordination)⁽⁴⁾。

此外，當探討人類如何建構意義時，社會建構主義學者特別注意結構和行動（或結果和過程、傳統和變遷）間的關聯性；換言之，社會建構主義學者主張在描述任何人類互動行為時，必須同時觀照互動發生的脈絡以及在其中運作的個人。因此，儘管社會建構主義強調人類是具備創造力的主動行為者，不過社會建構主義也同時看重互動行為發生的脈絡。因而社會建構主義的最後一項特徵是：強調沒有任何互動行為可以外於特定的歷史脈絡和文化脈絡。因此，行動意義將因其所在的脈絡之不同而改變，亦即行動意義不是絕對的，行動發生於何時 (when) (突顯特定歷史脈絡的影響)、何地 (where) (突顯特定文化脈絡的影響)，將左右意義或知識的內容 (Burr, 1995: 4)。

對於上述論點，我們可以藉由著名的意義協調管控理論 (Theory of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簡稱 CMM；Pearce, 1976, 1989)，得到更具體的了解。以傳播學者對社會建構主義觀點的回應而言，意義協調管控理論是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理論 (Griffin, 2000; Littlejohn, 1999)。CMM 主張，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行為（社會互動）創造社會真實，而社會互動是一種互動者間進行意義協調的過程，在此過

程中每個傳播者都根據個人的意義層級（hierarchy of meaning）以及前後傳播行為（the serpentine model）來理解傳播行為的意義（Pearce & Pearce, 2000: 410）。換言之，意義理解的脈絡不但存在於互動者性格、互動情節（合作、衝突）以及互動者關係（信任、尊敬），綿延不斷的社會互動過程中的過去行為（previous acts）與未來行為（subsequent acts）也形成另一種影響意義解讀的脈絡。

對社會建構主義學者而言，「互動」是人類生活中最重要的動力，社會生活就是一種互動過程，儘管所使用的語彙不相同，譬如，Baxter (1992) 使用「對話」(dialogue) 概念，Bochner 與 Ellis (1992) 建議「敘事」(narrative) 概念，Deetz (1994b) 強調「共決」(codetermination) 或「協調」(coordination) 概念，Stewart (1995, 1996) 主張「建構性闡述接觸」(constitutive articulate contact) 概念；但是這些概念意涵上卻是一樣的，亦即不是個人的「獨白」而是溝通者間之互動行為應該成為傳播學界的研究焦點。然而，並非所有的傳播學者都認同社會主義建構學者的觀點，譬如，有些學者就主張以比較靜態的「訊息」(message) (Peters, 1995) 或「符號」(symbols) 概念 (Cronkhite, 1986) 作為傳播研究的核心概念。但是根據本文上述的討論，突顯傳播行為之動態特質的互動概念，應該不失為一個比較理想的選擇。

參、 社會建構主義作為一個傳播研究方法

儘管多數傳播學者並不會質疑「互動觀點」作為一種學術主張的價值；但是，進行研究時，學者們卻多半不知不覺地集中在探討影響傳播行為的前置變數（antecedents）或者傳播行為的結果，而非傳播過程或互動過程的本身。我個人認為，之所以會發生此種研究信念與研究實踐間的不一致性，除了上述之概念性問題外，主要還是因為若干操作性問題也有待釐清。換言之，透過「互動觀點」，人類在生活世界的所有體驗不再有固定的意義，而是所有當事者間持續的互動與協商而來的產

物，因而真實將是由當事者所共同建構，其結果自然也充滿不確定。因此，既有傳播研究與理論中的「獨白特質」(monologic quality) (Baxter, 1992: 331)：無論是一個客觀真實世界的預設、配合預測和解釋需求的絕對性假設以及以個體作為分析單位，都必須被重新檢視。Pearce & Pearce (2000: 411) 在比較傳達模式 (transmission model) 與意義協調管控模式 (CMM model) 的不同時也指出，我們應該關心的不再是：傳播者說了什麼 (what is said)？傳播者想傳達什麼 (what is meant)？受播者理解了什麼 (what is understood)？而是：經由言說或行動，互動雙方共同完成什麼 (what do we make together by what is said or done)？

具體而言，傳播學者欲有效落實「互動觀點」之研究，進行研究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首先，「互動觀點」之研究的分析或觀察單位是「對話中的人」(persons-in-conversation) (Harre, 1984)，並且必須將其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拆解成一個人、另一個人以及他們之間的對話 (Cronen, 1995)，因為是「對話中的人」共同建構 (co-construct) 他們自己的社會真實。換言之，適當的分析或觀察單位必須是對互動行為的一種全面性觀照，譬如，言談文類 (speech genre；Bakhtin, 1986) 或者是民俗誌學取徑學者所說的言談事件或傳播事件 (speech event or communication event；Hymes, 1972) 概念，都是比較能夠有效落實「互動觀點」研究的分析或觀察單位。以民俗誌學取徑中的言談事件或傳播事件的概念為例，它們特別強調傳播本身的系統性、社會性以及文化性，因而實際檢視一個傳播事件時多半依循人類學家 Hymes (1972) 提出的 SPEAKING 八要點，以便能對研究的傳播事件有一個全面性的描繪：背景 (setting)、參與者 (participants)、目的 (ends)、行動 (acts)、調性 (key)、工具 (instrumentality)、規範 (norms)、文類 (genre)。

其次，研究者的角色也有很大的轉變，他不再是旁觀者 (spectator) 而是參與者 (participant) (Pearce, 1995)。換言之，研究者並非外於他所探討的傳播事件，研究者本身也是一個參與者，真實是由研究者與研

究對象所共創。因此，社會建構主義者也特別強調反身性 (reflexivity)，亦即認清研究者和其研究對象都是研究的一部分，因而研究者所提出的研究結果和研究對象的回應一樣，它們的正確性都必須被存疑，因為任何傳播事件都具備多元意義，研究者所受的訓練、持有的假設前提、提問的研究問題以及研究報告的書寫方式等因素，都會讓單一的研究只是反映理解該傳播事件的一種說法(而非窮盡所有的說法)(Leeds-Hurwitz, 1995a: 10)。簡言之，相對於其它研究取徑將反身性視為一種待克服的障礙（例如，Berger & Chaffee, 1987），社會建構主義將反身性視為一種「必要之惡」（例如，Bochner & Eisenberg, 1987）。值得注意地是，從「互動觀點」解釋人類生活世界，並非主張建立一個以研究傳播結果為焦點的傳播學門，亦即不是探討傳播變數對其它變數的效果，而是著眼於互動過程的結構與能動 (dynamics) 的本質，因為經由互動過程，一加一將不再只是二 (Pearce & Pearce, 2000: 410)；換言之，傳播學者必須探討「傳播過程本身的影響性 (consequentiality)」(Sigman, 1992a: 352)。

然而，這些抽象的主張如何被落實在研究的實作層面呢？我們可以分別從學者的研究建議以及幾個實際的研究例子來看這個問題。以人際傳播研究為例，傳播學者 Baxter (1992) 指出，記憶或遺忘對於關係伴侶而言，並非一種個人的內在認知狀態，而是一種「集體記憶」(collective remembering) 的產物 (Middleton & Edwards, 1990)，亦即透過共同慶祝值得紀念的日子或共話當年的懷舊時刻，聯合重建各自對雙方關係歷史的認知。其次，個人身分 (identity) 的建構也是一種「聯手完成的傳播事件」(a jointly enacted communication event) (Baxter, 1992: 334)，自我同時受到關係伴侶是否看重你的問題、回應是否具備支持性以及是否提供具體意見等行為影響 (Katriel & Philipsen, 1981)，因而自我的呈現不再如同傳統的自我揭露 (self-disclosure) 概念所揭示般，屬於單向性或獨白性特質。值得注意地是，以上研究建議的應用範圍並不會只是侷限於人際傳播研究領域，譬如，「集體記憶」概念已經被用來探討一

個歷史事件真相的浮現，實際上就是媒體報導、事件參與者以及媒體報導閱讀者三者所共同建構的社會真實而非客觀真實（Johnson, 1995）。

除了上述觀念性的建議外，在代表性的期刊上也可見少數從「互動觀點」完成的傳播研究，譬如，有別於以往以誘發順從（compliance seeking）的誘發者和誘發對象的單一策略為主的研究，Sanders 與 Fitch (2001) 分析兩份自然發生的誘發順從活動記錄後發現，真正的誘發順從活動是一種逐漸發展的（incremental）以及一來一往的過程（a give-and-take process），不但無法簡化為一組「要求（誘因）與回應」的互動行為，每一個傳播者也都同時在影響以及自我調整雙方對於何謂請求（solicitation）以及何謂回應（response）的界定；換言之，除了提出「要求（誘因）」或「回應」（亦即所謂的策略），Sanders 與 Fitch 發現「額外的交談」（additional talk）有其必要性，因為無論是循序漸進（progressive form）或回頭補充（regressive form），傳播者都必需依賴策略行為外的言談來建構一個共享的「請求與順從」之社會意義，而有效的誘發順從往往需要傳播者對「請求與順從」之社會意義達成共識。

其次，針對以單一言說行動作為分析單位 (the speech act as a unit of analysis) 的面子概念研究，Goldsmith (2000) 區分六種不同的建議請求行動序列並且證實，給予他人建議是否會成為威脅對方面子的舉動並非如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所預測般固定不變，而是會受到「給予他人建議」行動之前的「他人行動」內容所影響。譬如，當被建議者一開始就明白地要求建議、要求相關資訊或意見、揭露問題或宣布心中的計畫時，建議者的建議行為就比較不會挑戰被建議者的面子。誠如上述意義協調管控行為論所言（Pearce & Pearce, 2000），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行為是傳播者間進行意義協調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每個傳播者不只根據個人的意義層級來理解互動行為的意義，綿延不斷的互動過程中的過去行為與未來行為也形成另一種影響意義解讀的脈絡。

此外，我們向來習慣使用社會學名詞（例如，點頭之交、朋友、配偶）或心理學名詞（譬如，親密度）來界定人際關係類型，但是 Goldsmith

與 Baxter (1996) 的研究結果證實，我們也可以利用六種言談事件 (speech events)（包括道人長短、規劃、開玩笑、交代近來發展、閒聊、交換當天活動記錄）的出現比例，有效區分不同的人際關係類型（包括點頭之交、朋友、親密朋友、配偶、親子、兄弟姊妹等），譬如，當雙方交談紀錄中出現高頻率的道人長短行為時，往往交談者間的關係就是親密朋友。同樣的道理也可以用來探討「組織」本體論的問題，亦即回答：什麼是「組織」？從傳統管理學理論的角度來看「組織」，學者以分工和協調這兩個既定特質來辨識「組織」的存在與否；但是對於研究組織傳播的學者而言，「組織」是從成員的互動過程中浮現出來，因為組織成員的身分和角色是眾人互動協商而來的產物（Taylor, Cooren, Giroux, & Robichaud, 1996）。

肆、結論：推廣「互動觀點」之傳播研究

根據本文的論點，傳播學門必須建立在一個共同的信念上：從「互動觀點」驗證傳播過程本身的影響性和獨特性。誠如傳播學者 Sigman (1992a) 所言，生活世界中意義的創造過程，儘管不能外於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等變數之影響，但也不能輕忽互動行為本身的獨特影響性。換言之，我們不只是研究「傳播」這個現象，而且還要將傳播視為一個看人類生活經驗的角度，從「傳播觀點」（亦即「互動觀點」）理解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而什麼是「傳播觀點」呢？就是不再從既有的心理學、社會學或經濟學角度來研究人類的生活世界，而是研究向來被視為心理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現象如何在人類的互動行為中被製造與被複製。一旦傳播學門內部能夠建立上述共識，將可對目前隨著多元系所名稱而日益分化的傳播學門產生一定的整合效果，而傳統的分類（例如，將傳播研究分成人際傳播、小團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跨文化傳播等）也將逐漸喪失原有的分界功能，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共通的研究語法：在特定的時空脈絡下，我們的互

動行爲共同完成了什麼？

以目前國內傳播研究而言，符合上述「互動觀點」的研究不是沒有，只是仍然屬於「少數社群」，並非主流研究團體。根據最近一篇研究的整理（林麗雲，2001），國內部分傳播學者（林芳玫，1996；陳雪雲，1996）已經將新聞真實的產生視為一連串互動過程的結果。其次，我們也可以看見從「集體記憶」這個概念出發，以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這條路的整個改名過程為分析對象，突顯「集體記憶」的建構特質中的動態，亦即民眾應該記憶什麼或遺忘什麼，事實上是不同記憶系統間交換、協商與鬥爭的結果（夏春祥，2001）。此外，也有一些碩士論文運用 Ernest G. Bormann 的符號輻合理論（symbolic convergence theory）發展而成的幻想主題分析法，嘗試分析組織成員如何經由成員間「幻想覆誦」（chain out）的互動過程來建立團體意識和文化（例如，林文琪，1996；陳煥芸，1999；劉玉惠，1994）。換言之，國內「互動觀點」的傳播研究只是眾多研究觀點中的一個小支流，距離匯集百川而成為傳播學界的內部共識，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不可否認地，「眾聲喧囂」對一個學門的發展而言，是一個很弔詭的現象。從正向來看「眾聲喧囂」，它所體現的多元性象徵一個學門內部的高度適應力和強勁的活力；但是，當喧囂發生在與學門定位相關的議題上時，「眾聲喧囂」逐漸浮現它的負面意涵，因為一旦面對其它學門時，我們所需要的可能不再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而是對主導學門發展方向的分析性概念必須具備共識。傳播學者 Sigman (1992a) 早在十年前便預測，欲達成傳播學門內部的共識將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十年後我們再看整個傳播研究領域的現況，卻仍舊是「眾聲喧囂」過之，而整合性則是明顯地不及。因此，在台灣傳播相關系所最為蓬勃發展的十年（1991-2000）後（翁秀琪，2001：47），本文強調尋找學門主體性的重要雖然已是老調重彈，但是這一次希望能夠藉由本文這塊「磚」引出更多傳播學者的「玉」。

◎ 引文回憶

從「互動觀點」看生活世界：社會建構主義與傳播研究 69
◎ 本土化傳播學的前途

批判、沒有歷史清夢。

註釋

- (1) Gorgias 是著名的古希臘雄辯家 (sophist)，和其他古希臘雄辯家一樣，Gorgias 認為，絕對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因為一個人的所知受限於這個人的感官知覺。相對地，Plato 却主張此間存在絕對的真理，而人們必須努力將它找出來 (Neuliep, 1996)。
- (2) 根據傳播學者 Mumby (1997) 的分類，傳播研究背後隱含以下四種不同預設之一：實證性現代主義 (positivist modernism)、詮釋性現代主義 (interpretive modernism)、批判性現代主義 (critical modernism) 以及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各種預設對傳播、身分認同和知識間的關係有不同的主張。一個最簡單的區分方式是：實證性現代主義主張真理或真實是客觀存在的，傳播只是反映既存世界的工具。詮釋性現代主義和批判性現代主義雖然也相信真理的存在，卻強調真理或真實是一種相互主觀的產物，亦即傳播者透過彼此的互動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真實；但是，批判性現代主義比較偏重於探討意識形態、權力等因素如何影響真理或真實的形塑過程。後現代主義則完全推翻所謂真理的存在，因為已經不存在自主性主體 (sovereign, knowing subjects)，傳播（如果被界定為共享意義的形成）最後成為不斷解構真實而非建構真實的活動。
- (3) 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因而這個區分對於本文所主張的「互動觀點」十分重要。許多社會建構主義學者都主張（例如，Gergen, 1985; Pearce, 1995），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不同於社會建構主義 (social constructionism)，因為前者將傳播視為一種認識外在世界的個人認知過程，而社會建構主義則是將傳播視為一種創造外在世界的社會互動過程。換言之，儘管兩者都主張「我們建構自己的生活世界」，兩者在此一主張上的實質內涵卻存在極大差異。對建構主義而言，此一主張的內涵是：我們（每一個獨立的個體）建構（發展一個認知心像）自己的生活世界（來自感官知覺的事物知

識)；但是，社會建構主義卻是認為：我們（集體的對話者）建構（參與創造）自己的生活世界（自身就在事件與事物中）(Pearce, 1995: 98)。

- (4) 我個人認為，這兩項特質是缺一不可，而其中的「共決（或協調）」特質尤其重要。因為如果只是強調社會真實的「建構」特質，研究者有時候難免還是會以「個人」為研究分析單位；但是「共決（或協調）」特質卻能突顯真實建構過程的社會性與互動性，這項特質也正是本文所主張的「互動觀點」所要強調的。



參考書目

- 林文琪（1996）。《新聞論述建構之愛滋病語藝視野—以中國時報、聯合報為分析對象》，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芳玫（1996）。《女性與媒體再現—女性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林麗雲（2001）。〈傳播研究史：台灣傳播研究典範的峰迴路轉〉，「二十世紀傳播學門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台北：政大傳播學院。
- 翁秀琪（1997）。〈對台灣「傳播學正當性危機」的一些想法〉，《新聞學研究》，54：1-2。
- 翁秀琪（2001）。〈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29-54。
- 夏春祥（2001）。〈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盧建榮（編），《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107-148頁。台北：麥田出版。
- 陳百齡（2001）。〈從國科會傳播專題計畫提案看學門發展生態〉，《新聞學研究》，67：25-50。
- 陳雪雲（1996）。《新聞媒體之消息來源研究：以報導犯罪新聞為例》，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案。台北：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 陳煥芸（1999）。《新生的選擇：多層次傳銷論述之幻想主題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9-37。
- 鄭瑞城（2000）。〈學門獨立了嗎？〉，《傳播研究簡訊》，23：1-3。
- 劉玉惠（1994）。《聖界與凡界：慈濟論述之幻想主題分析》，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Atkinson, J. M., & Heritage, J. C.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rger, C. R., & Chaffee, S. H. (1987).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s a science.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15-19). Newbury Park, CA: Sage.
-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Doubleday.
- Bochner, A., & Eisenberg, E. (1987). Family process: System perspectives.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540-563). Newbury Park, CA: Sage.
- Burr, V. (1995).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ism.* London: Routledge.
- Carey, J. (1975). A cultural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2, 1-22.
- Cargbaugh, D. & Hastings, S. O. (1992). A role for communication theory in ethnography and cultural analysis. *Communication Theory*, 2, 156-165.
- Cronen, V. E. (1995). The consequential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capturing of experience. In S. J. Sigman (Ed.). *The consequentiality of communic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Cronkhite, G. (1986). On the focus, scope, and coherence of the study of humansymbolic activ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2, 231-246.
- Deetz, S. (1994a).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etz, S. (1994b). Future of the discipline: The challenges, the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contribution. In S.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7* (pp. 565-60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etz, S., & Stevenson, S. L. (1986). *Managing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Gergen, 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266-275.
- Goldsmith, D. J. (2000). Soliciting advice: The role of sequential placement in mitigating face threa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67, 1-19.
- Goldsmith, D. J. & Baxter, L. A. (1996). Constituting relationships in talk: A taxonomy of speech events in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 87-114.
- Griffin, E. (2000).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5th ed.). Boston:

- McGraw Hill.
- Harre, R. (1984). *Personal being: A theory for individual psych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slett, B. (1987). *Communication: Strategic action in context*. Hillsdale, NJ: Erlbaum.
- Hymes, D. (1972).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In J. Gumperz & D. Hymes (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Johnson, T. J. (1995). *The rehabilitation of Richard Nixon: The media's effect on collective memor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 Katriel, T., & Philipsen, G. (1981). "What we need is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s a cultural category in some American speech.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48, 302-217.
- Kellerman, K. (1992). Communication: Inherently strategic and primarily automatic.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9, 288-300.
- Leeds-Hurwitz, W. (1989).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life: A social interpretation*. Norwood: Ablex.
- Leeds-Hurwitz, W. (1992a). (Ed.). Forum: Social approach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 (2), 131-172.
- Leeds-Hurwitz, W. (1992b). (Ed.). Forum: Social approaches. *Communication Theory*, 2 (4), 329-356.
- Leeds-Hurwitz, W. (1992c). Forum introduction: Social approaches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 (2), 131-139.
- Leeds-Hurwitz, W. (1995a). Introducing social approaches. In W. Leeds-Hurwitz (Ed.), *Soci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pp. 3-20).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Leeds-Hurwitz, W. (Ed.). (1995b). *Soci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Littlejohn, S. W. (1999). *Theorie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6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Middleton, D., & Edwards, D. (Eds.). (1990). *Collective remembering*.

- Newbury Park, CA: Sage.
- Mumby, D. K. (1997).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 rereading of an ongoing debate. *Communication Theory*, 7, 1-28.
- Neuliep, J. W. (1996).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pplications & case studie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Pacanowsky, M., & O'Donnell-Trujillo, N. (1982).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46, 115-130.
- Pearce, W. B. (1989). *Communication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Pearce, W. B. (1994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reating social world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Pearce, W. B. (1994b). Recovering agency. In S.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7* (pp. 34-4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Pearce, W. B. (1995). A sailing guide for social constructionists. In W. Leeds-Hurwitz (Ed.), *Social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pp. 88-113).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Pearce, W. B., & Cronen, V. E. (1980). *Communication, action and meaning: The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ies*. New York: Praeger.
- Pearce, W. B., & Pearce, K. A. (2000).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the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 (CMM) through a community dialogue process. *Communication Theory*, 10, 405-423.
- Powers, J. H. (1994). *Public speaking: The lively art*. New York: HarperCollins.
- Powers, J. H. (1995). On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4, 191-222.
- Putnam, L. L., & Pacanowsky, M. (Eds.). (1983).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s: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anders, R. E., & Fitch, K. L. (2001). The actual practice of compliance seeking. *Communication Theory*, 11, 263-289.

- Shotter, J. (1987). Practically speaking: Whorf, the formative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knowing of the third kind. In R. Rosnow & M. Georgoudi (Eds.), *Contextualism and understanding in behavioral science* (pp. 211-227). New York: Praeger.
- Shotter, J., & Gergen, K. J. (1994). Social construction: Knowledge, self, others, and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In S. A. Deetz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7* (pp. 3-3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igman, S. J. (1992a). Do social approaches 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nstitute a contribution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munication Theory*, 2 (4), 347-356.
- Sigman, S. J. (Ed.). (1992b). *Introduction to human communication: Behavior, codes and social action*. Needham Heights, MA: Ginn Press/Smith & Schuster.
- Sigman, S. J. (Ed.). (1995). *The consequentiality of communic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 Shotter, J. (1990). *Conversational realities: Constructing life through language*. London: Sage.
- Smith, R., & Eisenberg, E. (1987). Conflict at Disneyland: A root metaphor analysi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4, 367-380.
- Stewart, J. (1995). *Language as articulate contact: Toward a post-semiotic philosophy of communication*. Albany: SUNY Press.
- Stewart, J. (1996). The symbol model vs. language as constitutive articulate contact. In John Stewart (Ed.), *Beyond the symbol model: Reflection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nature of language* (pp. 9-68). Albany: SUNY Press.
- Taylor, J. R., Cooren, F. , Giroux, N., & Robichaud, D. (1996). The communicational basis of organization: Between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text. *Communication Theory*, 6, 1-39.
- Wartella, E. (1994). Challenge to the profess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3, 54-62.
- Wittgenstein, L. (1953).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G. E. M. Anscombe,

- Tr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Zarefsky, D. (1993). Does intellectual diversity always serve us well?
Spectra, 29(4), 2-3.



Studying the social world from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Lin-Mei Hua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ddress th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disciplinary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and furthermore to propose social constructionism, characterized by it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action in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world, as the most appropriate perspective, in which communication scholars may find it possible to create a disciplinary mode of explana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a specification of commonalities among various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pproaches in terms of both their conceptual and research agenda. After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consider *interaction* as the core concep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ich, it is argued, can most clearly differentiate communication-centered discipline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aiwan is then examined from an interactional standpoint.

Keywords: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social constructionism, communicational, explanations, the identity of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Lin-Mei Hu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